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 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内在契合

左亚文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左亚文(1956-), 男, 湖北通城人,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哲学博士,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研究。

[摘要] 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飞跃的过程中, 无论是历史和逻辑的起点, 还是历史的逻辑和逻辑的历史, 都昭示了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 其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逻辑与历史、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矛盾统一的过程。具体考察这一过程中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内在关系及其相互转化的机制, 探讨邓小平理论逻辑的风格和个性特点, 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过程的一般规律。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邓小平理论; 理论逻辑; 历史逻辑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5)06-0673-06

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飞跃的理论成果, 它的贡献不仅表现在理论上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崭新意义的思想和观点,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和新阶段; 而且体现在理论形态上形成了一个严整而完备的逻辑体系, 使之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成熟形态。深入分析构成这个理论体系的内在“理论逻辑”, 考察它赖以形成和发展的社会的“历史逻辑”, 阐明“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二者之间如何实现转化的机制及其辩证关系, 对于我们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飞跃中的一些带有本质规律性的东西, 从而更深刻地理解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和时代价值, 特别是更深刻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般规律,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向前进, 都具有很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历史的起点和逻辑的起点

恩格斯在谈到逻辑和历史的关系时曾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 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1] (第43页) 一般认为,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在时间上应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起点。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全会上, 我们党确认了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和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提出了清理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从而推动了社会主义改革的起步。这反映在理论体系上, 思想解放、实事求是作为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也成为它的逻辑起点。在这里, 历史的起点和逻辑的起点是一致的。对于这一点, 理论界的大多数人是认同的, 而且这也确实符合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客观实际。但是, 即使是正确无误的判断, 我们也不能加

以绝对化的理解,而应从辩证的观点出发,给予更深刻、合理的诠释。

首先,历史的起点和逻辑的起点并不是完全重合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时空,任何人也更改不了。但是,在邓小平的思想发展逻辑中,必须通过改革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错误,必须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而转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这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早就存在了。邓小平自己就曾说过:“其实,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2](第 255 页)如果作进一步追溯,邓小平在“文革”中第一次被打倒时,特别是在江西住“牛棚”的那些日子里,就开始了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反思,新的思想萌芽已经在他的头脑里酝酿产生。在理论逻辑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精髓也是在进行整顿、拨乱反正和改革实践中逐渐形成和深化的,并不是一开始就达到了“表里精粗无不到”的理论水平。假如我们以纯粹客观的事实为标准的话,那么,在理论逻辑上应以经济整顿和经济重心转移为起点,在历史逻辑上应以 1975 年的“整顿”为起点。但是,无论历史的逻辑和理论的逻辑,还是二者起点的一致,我们都不能单纯地跟在“事实”的后面跑,而要通过理性分析,抽象出历史和理论中的“逻辑”,即带有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而排除掉起干扰作用的偶然因素。这样,即使理论的逻辑和历史的逻辑不是完全重合,也是合乎逻辑的。马克思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指出,逻辑和历史往往是不一致的,例如黑格尔的法哲学,以占有为起点范畴,但是,在家庭或主奴关系这些具体得多的关系之前,占有并不存在。但这并不妨碍黑格尔正确地把占有作为其理论体系的起点范畴。^[2](第 20 页)因此,历史和逻辑的一致,即使在起点上,也是本质上的基本的一致,是合乎逻辑的理性的一致,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完全的重合。如果我们从完全重合的意义上理解这种一致,那么就会把复杂的历史现象和理论思维简单化。

其次,历史的起点和逻辑的起点并不是一个截然的时空分割,而是一个历史和理论的关节点。如上所述,邓小平理论无论是历史的逻辑还是理论的逻辑,把它的起点定在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都是相对的,因而只有相对的合理性。那么,我们为什么又要在时间上作这样的一种分段呢?这种分段的合理性何在呢?这就涉及到对这个时间起点究竟如何看的问题。从哲学上看,任何一个在时空中运动的点都不是一个绝对的“定在”,它只是表示事物的运动在每一瞬间既在这一点上又不在这一点上。至于事物发展过程中引起其质变的“关节点”,更是以扬弃的形式集中反映了新旧事物之间的联结。我们应该以这样辩证的观点来看待邓小平理论在历史和逻辑上的时间分野。这样,时间上的起点就不是一个僵死的凝固不变的“临界点”,也不是一个截然的时间分割,而是一个历史的关节点,一个历史阶段和一连串历史事件的中心点。作为这样一个“关节点”和“中心点”,一方面它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前期量的积累和准备,另一方面它又联结和贯通着前后的历史事件和理论逻辑体系。它是这样一个“点”,它既是起点,又是终点,是一个首尾衔接的联结点。从历史的逻辑看,它既是量的积累的终点,又是新事物开端的起点;从理论的逻辑看,它既是新理论创造的起点,又是先前理论探索的终点。这样的理论分析似乎有些抽象,那么,让我们回顾一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历史的和理论的发展情况吧。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历史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自 1976 年底粉碎“四人帮”后,全党和全国人民迫切希望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状况,迫切希望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迫切希望在思想理论上进行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工作。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不过是上应天理、下顺民心的一种历史选择。从理论上,从解放思想和恢复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也有其理论的合理性。当时,我们党虽然取得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但是,教条主义的影响并未肃清,个人崇拜仍旧盛行,“两个凡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来的。不解放思想,就不能破除“两个凡是”,消除教条主义根深蒂固的影响;不恢复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不能顺利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因此,在理论上,从解放思想和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入手,就成为一个不可逾越的理论问题。可见,历史和逻辑的起点所表示的是这样一种必然性,一切历史变动都朝这个中心点聚合,一切理论创

新都必须从这里开始,只有以此为起点,历史的逻辑和逻辑的历史才能有更深广的展开。

再次,历史的起点和逻辑的起点都以高度浓缩的形式,再现了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世界社会主义改革浪潮的兴起。自1956年苏共二十大及其后接连发生的波匈事件之后,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诸国都先后走上了改革之路。我们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也开始以苏为鉴,对苏联模式进行反思,尝试探索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纵观这一艰难而曲折的世界社会主义改革浪潮沉浮进退的过程,我们不难看出,破除对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的迷信,解放受束缚的理性思维,实事求是地从本国的具体情况出发,走出一条具有本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的起点。任何国家要走改革之路,都无法绕开这一历史和逻辑的起始点,除非它自外于改革的浪潮之外。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是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我们不可能制定改革的方针。同样,没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世界社会主义改革浪潮的冲击,我们也不可能走上改革之路。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是一个缩影,从这个缩影中,我们可以透视整个20世纪后期世界社会主义改革浪潮的一幅跌宕多姿的历史画卷。

二、历史的逻辑和逻辑的历史

所谓历史的逻辑,按马克思的话说,就是“范畴的世俗历史”、“与时间相一致的历史”,亦即“现实的历史”^[3](第146页)。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来说,历史的逻辑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发展过程。这是“历史的逻辑”最基本的涵义。除此之外,历史的逻辑还有一层派生的涵义,就是指思想理论自身的发展行程。按黑格尔的说法,它是指精神“在思维领域中的展开”,是精神“表现其自身于思维中作为在时间中进展着的存在”^[4](第36,37页)。它是“世俗历史”在人们头脑里的自觉反映,而这种自觉反映的过程在人们思想中又以近乎“世俗历史”的自发形式表现出来。如果说,前者是现实历史的逻辑,那么,后者则是思想历史的逻辑。前者在现实中以感性物质的形式展开的,后者则是在思想中以理论逻辑的形式展开的。二者尽管在表现形式上不同,但都是客观的自然的的历史发展过程,是统一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机的构成环节。

所谓逻辑的历史,按马克思的话说,是指“理性中的系列即范畴的逻辑顺序”^[1](第146页)。这表现在邓小平理论中,就是概念、范畴及其基本理论观点在理论体系中的先后叙述顺序及其内在联系。逻辑的历史是现实的历史逻辑以及思想的历史逻辑在理论形态上的主观反映和逻辑再现。

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和逻辑的历史就具体展开为三重关系,即,现实的历史和思想的历史的关系;现实的历史和逻辑的历史的关系;思想的历史和逻辑的历史的关系。

毫无疑问,逻辑的历史即理论的逻辑作为一种自觉的意识形态,不能机械地复写现实的历史和思想的历史。无论是现实的历史还是思想的历史,它们“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2](第43页)所以,理论的逻辑必须排除那些起干扰作用的偶然因素,必须摆脱历史形式中的那些曲折和枝蔓,按照历史的本质规律,以抽象必然性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向我们指明的关于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惟一科学的方法。但是,就邓小平理论来说,这里有几个需要深入研讨的理论问题:

第一,自发的现实历史和思想历史如何转化、升华为自觉的理论逻辑,其内在机制是什么?人类思想的发展史证明,大凡理论上的创新和突破,都源于历史实践面临的巨大矛盾和问题。没有时代危机和矛盾的逼迫和推动,就不会有思想巨人的出现和理论上的重大创造。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充当这样的思想巨人,之所以能够完成由实践到理论的转化和升华,除了他的特殊经历和超人的睿智、精神和意志外,就是他在思想理论上彻底的批判和革命的精神。他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基本点和精髓就是实事求是。他还说过“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泽东讲的实

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4](第382页)正是由于坚持了彻底的唯物主义,所以他能够把解放思想贯彻到底。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道理谁都能懂,但是,能不能抓住时代的症结,在时代的根本问题上也能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建设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邓小平早在改革之初就敏锐地指出,这个根本问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撇开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把握住这一时代最深层最集中最根本的问题,这本身已是超乎寻常的洞见,邓小平伟大之处还在于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彻到了这一根本问题之上。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所指出的,“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拨乱反正,全面改革,从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近二十年的历史性转变,就是逐渐搞清楚这个根本问题的进程。这个进程,还要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下去。”^[9](第416页)为了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生产力标准,把它当做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是非对错的根本准则,并有针对性地指出不要搞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邓小平的这些思想特别是“三个有利于”的生产力标准,等于交给了我们一个最锐利的锐利武器,它不仅把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给我们指明了一条如何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指导性线索。

在社会实践和思想理论两个领域,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是没有矛盾和斗争的,尤其是在历史转折时期。从20多年的改革实践看,几乎在每一个较为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都会有不同意见的争论。这当然是一种正常现象。但如何把这些不同意见引导到一个正确的轨道上去,又如何把这些不同的意见汇集起来,经过加工和改造,把它提升为科学理论,用以指导改革的实践?这里有一个内在的转换机制问题。邓小平说,我们的改革政策不过是把人民群众创造的好的经验总结起来,然后加以推广。农村的承包制改革就是这样。当年,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也是总结了来自下面群众的发明,倾听了来自实践的声音。问题是,为什么列宁和邓小平能够敏锐地发现这些新鲜经验,又如何能够识别哪是好哪是不好的经验?这里关键还是一个检验的标准问题。这个标准就是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就是一种彻底的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精神。列宁和邓小平并不是什么先知,但是,他们都十分重视在实践中的试验作用。当发现错了的时候,就迅速和急剧地改变行动的路线。“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干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4](第372-374页)“七次量衣一次裁”,“我们初次从事新的事业,聪明才智从哪里来呢?我们这样试试,那样试试。”^[3](第283页)列宁曾说过,社会主义建设就是一场试验。邓小平也说过,“改革开放是很大的试验”^[4](第130页)。强调实践,重视试验,善于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敢干正视和改正探索中的失误,始终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这就是列宁和邓小平两位革命家和改革家的共同点,也是他们之所以能够把群众的智慧和实践的经验集中起来,化为改革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升华为理论的原因。

试验是实践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实践中主观能动性和探索性的集中体现。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并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是一个主动的“试错”过程。这个过程并不像我们过去所想像的那样,只发生在实践过程之后,而是贯串在整个实践过程之中。因此,试验在实践中就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由于邓小平像列宁一样,高度重视实验的作用,并大胆地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改革和建设的试验,所以,就能够最先和最早发现人民群众的创造发明并凝炼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

第二,历史的逻辑和理论的逻辑之间的辩证关联。从认识论上看,历史的逻辑决定理论的逻辑,理论的逻辑源于历史的逻辑;先有历史的逻辑,然后才能理论的逻辑。但实际的过程似乎并非如此。由于理论具有能动的作用并以抽象的形式表现出来,它不仅能够把曲折的历史过程加以逻辑的“纯化”,而且能够根据历史的逻辑预见未来的发展,以有效地指导人们的实践。因此,在历史过程中,理论的逻辑往往先于历史中的逻辑,在社会变革中充当先导的作用。我国的改革实践证明,没有理论上的创新的突破,

就没有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大发展。试想,我国改革和建设过程每一次大的飞跃式发展,从党的工作重心的重新确立、农村承包制的实行,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哪一次不是理论创新和思想解放的结果呢?理论走在实践的前面,在改革中起开路先锋的作用,恰恰证明理论具有超前性和先导性。然而,具有超前性和先导性的理论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思想家的主观构想,它归根结底源于实践的推动,并最终服从和服务于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飞跃的伟大成果,邓小平理论之所以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和新阶段,就在于它始终保持了这种生机勃勃的创造活力,对中国的改革和建设发挥了巨大的先导作用,这正是邓小平理论的理论逻辑力量之所在。

理论创新没有止境,思想解放也没有尽头。现在,我国改革又到了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实践呼唤理论的创新和思想的解放。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就要根据新的实践和新的形势,大力弘扬理论创新的精神,进一步推进思想解放的进程,始终保持理论与时俱进的品格,继续发挥理论的先导作用,以此推动我国改革的深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第三,中国历史逻辑的特殊性和理论逻辑的普遍性。从20多年改革的进程来看,我国的改革是从经济这一头开始的,以经济体制的改革带动政治和文化体制的改革;而经济体制的改革又是从农村承包制的推行开始的,以农村的改革促进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践证明,在一个有10几亿人口的大国里进行前无古人的改革,政治的稳定是第一位的。因此,在改革的指导思想上,先从经济体制改革着手,实行稳步、渐进的方针,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一种合理和明智的选择。这反映了中国改革历史逻辑的特殊性。不仅中国的改革由于其具体性而表现出这样的特殊性,其他国家的改革也必然如此。从主观愿望和激情出发,对我国改革所走过的这条特殊道路盲目地加以批评和指责,是一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

但是,理论逻辑的最大特点是具有普遍性的品格。实践固然也具有这样的品格,却不是直接表露在外的。理论的任务就是要从实践的具体性和特殊性之中揭示其普遍性和一般性的规律。作为实践对象的世界在走着自己的路,它有自身客观发展的逻辑规律,并不因我们的主观选择和设计而有所改变。例如,改革本身是一个系统工程,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经济体制改革必然涉及到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改革,尽管我们的改革有先有后,但这种联系却是客观的,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它本质上要求我们把它如实地当作一个系统来对待。因此,理论的逻辑就不能只是跟在历史的逻辑后面亦步亦趋,把自己仅仅局限在历史逻辑的特殊性范围内,而应该超出这种特殊性,发现特殊性中的普遍性。理论如果没有这种超越的能力,不能突显自己普遍性的特点,那么,它就无力承担起指导改革的历史任务。邓小平理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凸显了理论的普遍性和超越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阐述中国改革的特殊道路,证明了改革必须从本国的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的普遍性;二是论证了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全面推进的普遍性。在解读邓小平理论的时候,我们往往只是从实用的观点出发,注意到了它的特殊性,而对其蕴含的普遍性和系统性的思想注意不够。在我国的改革进入新的阶段之后,积极发掘邓小平理论逻辑中的普遍性和系统性的思想就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四,邓小平理论逻辑的风格和个性问题。从邓小平理论体系的主体结构来看,它主要包含了一个精髓,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个基本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三大理论支柱,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邓小平理论的这五个组成部分是内在统一的,第一部分是灵魂和内核,它贯彻于整个理论体系之中;第二部分是总纲,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总问题和总矛盾;后三个部分是改革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而且具有全局性的意义。

诚然,这样的理论结构,从形式上看,它不是一个纯范畴和概念的体系,它也没有严格遵守从抽象到具体的原则以及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原则,而是直接从问题和矛盾着手,进行理论的阐述。但这不等于说,它就没有逻辑,它是一种形式上不同于纯学术研究的逻辑,是一种更贴近现实生活的逻辑,是一种更适合时代问题研究的逻辑。它在本质上仍然遵守了从抽象到具体的原则以及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原则。它所涵盖的五大部分之间,就有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总问题到分问题的层层推进,逐步深化的过

程,而且这一逻辑过程与改革实践的发展以及邓小平理论本身的发展这一历史逻辑也是基本吻合的。有些同志不加分析地把邓小平理论与黑格尔的《逻辑学》和马克思的《资本论》进行简单的类比,这是很不恰当的。当代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坚决反对体系构造,推崇对问题哲学的探讨,难道我们就认为它不是哲学吗?邓小平理论能够解决我们时代的现实问题,能够指引中国人民实现振兴中华的宏伟大业,我们把它称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把它看做是严密而完备的理论体系,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参 考 文 献]

- [1] [德]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3] [德]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 [德] 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 [6] [俄] 列宁. 列宁全集:第3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 叶娟丽)

Interna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History Logic and Theory Logic in the Second Leap of Marxism-Sinolization

ZUO Ya-wen

(School of Politics & Public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ZUO Ya-wen (1956-), male, Doctor,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School of Politics & Public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arxist philosophical history and Marxist philosophy.

Abstract: The history logic and theory logic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ENG Xiaoping's Theory, as a great achievement of the second leap in Marxism-Sinolization, is a complicated process, which is the unity of opposites of logic and 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subject and object. The research on the problem has an important meaning of theory and practice.

Key words: Marxism-Sinolization; DENG Xiaoping's Theory; history logic; theory logic